

UCCA Dune 对话回顾 | 编织我们的未来



UC 沙丘 CA Dune CFG-Barco aranya 中影巴可

2025 年 4 月 27 日至 10 月 12 日,UCCA 沙丘美术馆呈现中国艺术家胡尹萍的特别展览"你可以随时开始"。 作为胡尹萍艺术项目"胡小芳"十周年的重要纪念,本次展览通过一系列沉浸式的混合媒介作品,将观 众带入毛线与织物交织的细腻世界,在柔软的手工劳动中体察女性经验与艺术表达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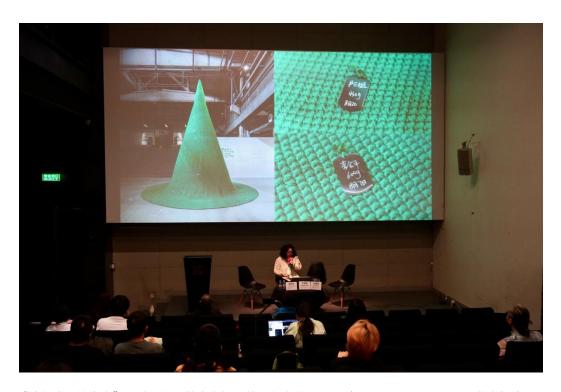
9月27日(周六)16:00-17:30,UCCA邀请艺术家胡尹萍、香港六厂纺织文化艺术馆策展人王慰慰,以及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候选人孔煜也,展开一场围绕"织物、劳动和女性经验"的对话。胡尹萍从"胡小芳"项目十年的发展谈起,分享她如何在 UCCA 沙丘美术馆的展览中继续探索毛线与织物所承载的记忆与情感。王慰慰结合自身的策展实践,讨论纺织文化与当代艺术之间的互动、彼此影响,以及



手工技艺如何在当下被重新激活,进而为文化遗产的创意性传承和社区的凝聚力注入新的可能。孔煜也分享了她对数字零工经济中"织女"群体的研究。她关注那些借助平台基础设施从事纺织劳动的女性: 她们来自不同背景和技能层次,逐渐发展出丰富灵活的零工技术策略,实现手工编织和平台逻辑的"双重编码"。从数字化劳动的实践出发,孔煜也将引导大家思考女性劳动与技术之间的张力。三位嘉宾将围绕纺织的观念与实践展开讨论,探索以纺织为起点集结女性社群的意义,共同想象如何"编织我们的未来"。本场活动由 UOCA 公共实践策划人王佑佑主持。

胡尹萍: 在劳动和艺术之间创造一种可能性

从妈妈到"阿姨":个体经验如何书写共同叙事



"编织我们的未来"活动现场,艺术家胡尹萍正在演讲,2025 年 9 月 27 日,UCCA 北京报告厅。



作为本次 UCOA 沙丘美术馆的展览艺术家,胡尹萍首先分享了她的艺术项目和系列作品的来由。一切始于十年前的一次归家,当胡尹萍看见母亲在老家的小凳子上编织帽子以换取几毛钱的收入时,她对母亲的时间被如此廉价地收购感到愤懑,也对当代妇女零工劳动能换取的价值产生了质疑。出于这样的契机,她开始了胡小芳项目——一个长达十年、参与人数成百上干的艺术实践。一开始只有胡尹萍的母亲,后来四川同乡、甚至其他省市的类似年龄和处境的阿姨们也加入了,她们从共同的编织中汲取力量和养分:不再是工厂统一要求的重复的雷同的帽子,而是母亲和阿姨们可以发挥自己创意、自由决定模样、技法和内核的帽子和毛线织品;不再是机械的、零散的、个人的编织,而是几十、数百人共同交流、形成庞大编织社群的集体创作。

"绿帽子"的故事:小芳、展览与出海

据胡尹萍介绍,胡小芳这个项目可以被分为五个阶段,而最开始的阶段"小芳"则是从绿色的帽子开始。 考虑到长时间编织时绿色对眼睛更友好,她就让朋友扮演虚拟商人"小芳"从母亲那里收购绿色帽子。 这些母亲做出的、不同于"厂货"的帽子异常受到欢迎,甚至在北京做了一次展览。而随着高价收帽子的"小芳公司"在乡里传开,同乡的其他阿姨也参与了进来。在"小芳"的协调下,她们编织的作品受到了媒体与海外的品牌赞助,并最终在爱尔兰的"绿帽子节"得到了展出——本土含义不吉利的绿帽子在文化不同的土壤里得到了截然相反的待遇和前所未有的认可。此后,她们也接连制作了"打破吉尼斯纪录"的五米高绿帽子,以及在美国支持女性权益游行的粉色猫咪帽。最初的出海成功给予了胡尹萍和阿姨们对"小芳"的信心,让她们突破对自我的怀疑、抱着希望和勇气继续编织创作。





"小芳公司"的阿姨们织出的帽子在爱尔兰的"绿帽子节(St. Patrick's Day)"展出,图片由嘉宾提供。

雪白的鸽子、安全感与"联合国"

项目的第二个阶段是"雪白的鸽子"。在这个阶段,"小芳"虚构了一个法国海滩比基尼大赛,邀请阿姨们为自己或家人编织比基尼。胡尹萍说,阿姨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织了将近两百套衣服。这些比基尼展现了阿姨们继最初的帽子后,对日常生活和美进一步的创造力。织好之后,"小芳"也试图邀请专业模特们来穿,但只穿了两套,计划就匆匆停滞,因为太贵。她们最终在网上找名模照片、并将比基尼 PS 到模特身上,以一种堪称魔幻现实主义的方式展现了阿姨们同样稀奇古怪的毛线比基尼。





名模"穿上"阿姨们织的毛线比基尼的样子,图片由嘉宾提供。

在那之后,"小芳公司"愈加发展,迎来了项目的第三阶段。经历工作室 19 次搬家、甚至被房东驱逐的 胡尹萍收到启发,给阿姨们布置了探索"安全感"的命题——当遇到危险、或是家中遭到侵袭时,阿姨们如何赶走坏人、保护自己或是自己的家人?她得到的答案既是抽象的想象,又是具象的抵抗:从织制的武器到看家护院的小狗,从毛线组成的脏话到结实的门,从五彩缤纷的门神到摆成阵的蚊香,这些各式各样的毛线织物不仅是色彩斑斓的物本身,更是阿姨们心里面对更大的世界里筑起的一道想象的防线和柔韧的墙壁,带给她们自身和家人们爱与安全感。在这样的保护下,阿姨们想象中可能的坏人——地



狱里的怪物、偷到钱的贼、跌跌撞撞的酒鬼、不给签字的外国老板和"最坏"的小三——都无法轻易入侵。

在后来的第四、第五阶段里,小芳又问道: "阿姨们认为自己的家是怎样的?你们理想生活的配置应是怎样的?"作为回应,阿姨们织起了属于自己家的旗帜图案和房子模型,为生活造出属于自己的图解。



阿姨们想象中的坏人与抵御坏人的武器——"小三"、狗与仙人掌,图片由嘉宾提供。

在零工劳动与艺术创造之间提供一种可能性

在一次又一次的编织实践中,阿姨们不仅挣到了正当报酬、获得了更多外界的肯定和创作的自信,也对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增进了更多观察、思考和趣味。胡尹萍说,比起今天她们要吃什么、买什么鱼、给孩



子们买什么玩具,当代艺术一点都不重要。"因为她们这代人可能是非常模糊的一代人,你不会向一位临时的清洁工阿姨要 CV 的。但是我觉得,她们应该最需要去想一想自己这一辈子都做了点什么。"在她看来,阿姨们自身的生活是最重要的。通过参与这个事情,阿姨们或许更好地感受了她们自己的生活,也用最简单的技法和方式编织出了她们想要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胡尹萍的作品,在阿姨们的零工劳动和艺术性创造之间,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王慰慰: 纺织艺术、文化遗产与社群营建



"编织我们的未来"活动现场,嘉宾王慰慰正在演讲,2025 年 9 月 27 日,UCOA 北京报告厅。



自 2019 年加入 CHAT 香港六厂纺织文化艺术馆以来,策展人王慰慰开始密切关注纺织艺术、纺织艺术家以及相关文化、工艺。她的演讲呈现出了纺织艺术在系统化、商业化艺术机构里的表现形式与价值,展现了香港与东亚不同地区相互影响的近现代纺织业历史,以及纺织文化注重社区发展、促进国际交流的当下。在本场演讲里,她分别从纺织艺术、文化遗产和社群营建三个层面上,介绍了她所工作的 CHAT 六厂在保存、传播和发展纺织文化艺术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CHAT 香港六厂纺织文化艺术馆,图片由嘉宾提供。

六厂与香港: 纺织厂的过往

王慰慰首先从宏观历史入手,将纺织业嵌于香港的经济与工业发展脉络中,介绍了纺织六厂与香港纺织



工厂的过往。她指出,大家熟知的香港多是以港片、粤语流行音乐为代名词的香港黄金年代,但其实香港在 60-80 年代是一个以轻工业生产为主的社会。"大量纺织厂在 49 年之后从大陆迁到香港,很多上海和江南地区的资本家也来香港开设了纺织厂。六厂前身位于的香港荃湾地区在 60-80 年代的时候,曾经有过 50 多家纺织厂。很多学校、医疗设施,甚至是一些慈善单位,其实也都是由纺织业扩展出来的。所以纺织业对于整个香港社会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遗产。"王慰慰分享道。改革开放之后,很多的纺织厂南迁、北迁,回到深圳、广州,还有一些搬到了东南亚,香港纺织业逐渐式微。CHAT 的原身正是这些消亡的纺织厂之一。作为策展人,也是 CHAT 发展的见证人,她所看到的六厂纺织文化艺术馆正是基于这样活化纺织文化遗产、重新连接社群的愿景诞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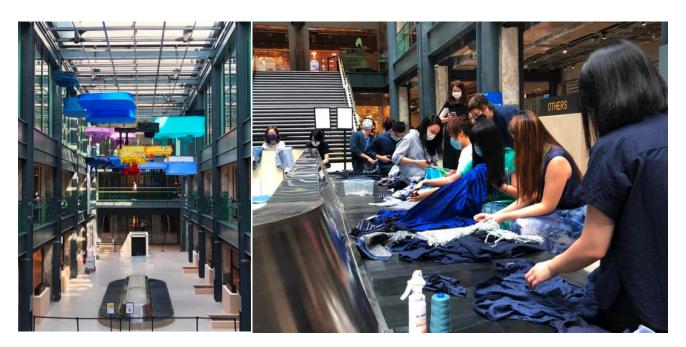
CHAT 香港六厂纺织文化艺术馆前身——南丰纺织,1970 年代,图片由嘉宾提供。

纺织作为一种内核与实践

作为六厂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纺织不仅仅是其倡导的艺术材料和创作方法,更是一种研究文献和精神内



核。在王慰慰参与策展的几个项目中,纺织都承载着更加深刻的艺术和社会内涵。在她加入 CHAT 后的第一个项目——尹秀珍个展"补天"中,由于恰逢疫情,世界停摆,项目从 2020 年被迫推至年底,原先的计划面临挑战。而尹秀珍最终给出的构想恰恰将艺术置于这样的变动和临时性中:在世界停摆时,大家是否还向往着那个可以全球旅行的时代?在世界静止时,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基于这样的设问,艺术家与策展人将空间的一楼大厅改成了候机厅,并在天花板上悬挂了将近十组纺织材料做成的彩色行李箱,以叩问观众与时代,叩问渺小的个体和希望被悬置的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个作品也以形式本身阐释了"补天"二字的内涵:艺术家在天花板上悬挂的行李箱软雕塑,正是是联合公益机构、学校的师生等社会不同参与者以及观众,在展出现场拼布制作出来的。这一实践将布料的材料性放大到了更宏观的社会层面,通过引导观众与布料的直接接触——拼、补、缝——将属于艺术家个体的纺织交到了更大的社会公众中手中,将观众置身于艺术里、也置身于一种修补临时性危机的共同当下。



CHAT 2020 年冬季展览"尹秀珍:补天"现场,图片由嘉宾提供。



以霉菌见纺织,以模型见历史

另外一个由 CHAT 委托、王慰慰参与策展的作品,韩国艺术家朴智希(Park Jeehee)创作的《椭圆形轨道(半个月亮在夏末落下)》(Drawing Elliptical Orbit)则展示了纺织作为艺术材料的另一种可能性。比起直接采用纺织的方法与纺织的内容,她选择呈现纺织厂和纺织机器的历史。2021年,她前往南丰纱厂调研,从工厂大楼各处收集霉菌样本,并用模具复刻建筑表面印记和旧机器零件。之后,她将标本带回首尔,在模具中培养和提取色素,用它们将树脂染色,最后使用矽胶印记制作了各种形状和大小的晶体块。"很有意思的是在这个晶体的模型上面,大家可能现在看的不是很清楚,有一个英文字是 TOYOTA INDUSTRY,也就是大家都了解的丰田汽车的那个'TOYOTA'。其实丰田最早的时候是以纺织业起家的,所以这个机器是早年香港进口的日本纺织机,这个作品也可以从某种角度上可以看到一种亚洲的纺织业之间的一个历史交流关系。"王慰慰说。通过这样的方式,霉菌成为了时间的胶囊,它凝聚了这座工厂从机器到空气的历史,是这个纺织厂真正的时间的见证者。



艺术家 Park Jeehee 与她的作品《椭圆形轨道(半个月亮在夏末落下)》,图片由嘉宾提供。

纺织在亚洲:图案演变与全球景观



"CHAT 每年都会邀请一位海外艺术家来驻留。我们对驻留的要求是艺术家对香港的纺织业或者是本土文化感兴趣,进行三个月的研究工作之后,艺术家可以在我们未来的某个展览中去呈现一件作品。"王慰慰介绍道。古尔努尔·穆卡扎诺娃(Gulnur Mukazhanova)是 2022 年 CHAT的驻留艺术家,来自哈萨克斯坦。她的作品不仅体现了纺织作为一种材料与方法所具有的本土性,更展现了纺织在全球化脉络下作为一种产业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可能性。穆卡扎诺娃来自有着深厚纺织与布料历史的中亚,对香港过往的纺织业,以及如今作为布料进出港口的角色十分感兴趣。驻留期间,她遍访传统布料市场,了解香港纺织业,其中也包括八九十年代纺织业式微之后,香港成为中国大陆进口或出口织物中转站的故事。同时,她也发现许多在哈萨克斯坦广泛流行的布料,尤其是传统图样,实际上有大部分在中国生产。这些发生在香港的、关于纺织业的诸多经济、文化交融的节点促成了她的作品:她将哈萨克布料带到香港,再用香港的布料进行拼贴。通过拼合大量不同母题与图案,采用不同材料或人工,穆卡扎诺娃审视了传统亚洲图案的历史演变,强调了它们的政治象征意义和文化意义,并以具象和抽象的方式将它们与当代全球景观联系起来。



艺术家 Gulnur Mukazhanova 和当地观众合作拼贴, 2022 年 6 月, 图片由嘉宾提供。



孔煜也: 互联网织女的双重编码

作为青年学者,孔煜也长期关注纺织技术与妇女劳动,互联网织女则是她自疫情以来持续着眼和研究的一个群体。在本次演讲中,基于她"双重编码:作为数字零工的互联网织女研究"的课题,孔煜也将织女放在宏观的中国社会零工经济语境里,分享了织女的双重编码这一概念来源,以及学员包、原创设计变现等基于数字平台的织女具象经验,为互联网织女这一群体提供了珍贵的民族志研究范本,也提供了一种对当代中国妇女劳动的想象力。



"编织我们的未来"活动现场,嘉宾孔煜也正在演讲,2025 年 9 月 27 日,UCCA 北京报告厅。

中国零工经济中的妇女



演讲的开始,孔煜也介绍了"互联网织女"的研究背景。这一群体尽管在语言和学术系统中显得边缘,但在社会中远非孤立,反而深植于当代中国甚至世界经济大环境中: "近些年来,零工经济在中国和全球语境下已经是一个主流的就业方式了。实际上 2021 年末的(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全部就业人员的1/4 都在灵活就业的板块当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全球各个地区都有研究者发现,所谓的零工经济实际上复制了传统经济性别等级的结构,而且零工经济中很多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像性别工资差距、就业准入歧视等等不仅存在,而且可能正在加剧。"在近年的就业与职场相关语境中,以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为代表、男性占多数并进行长时间固定劳动的零工经济得到了更多曝光和话题度,相反,以家庭或其他私领域劳动场合为主要劳动场景的零工群体受到较少关注,这几点恰是妇女零工常常表现出的特征。她们多为这些男性员工的妻子、全职家庭主妇,在男性劳动者长时间在外奔波时承担看顾老人小孩、处理家庭事务的责任。"妇女的零工经济"本身鲜少受到真正关注。而互联网织女涵盖妇女背景之广、人群之大,作为当代妇女零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例子。

双重编码:编织即编码,以及平台编码

在孔煜也的研究中,互联网织女的"双重编码"是最核心的概念。第一重编码指的是编织时遵循的技术逻辑。与许多人想象的创意劳动不同,编织可以说是一种技术劳动。要织出一个玩偶,一位掌握一定技术的织女可以纯粹依靠"图解",一套以数字和字母组成的编织代码来完成工作,甚至不需要看实际的产品成图。"实际上编织劳动本身就是一种编码劳动,这个可能是不懂编织的人很难发掘的一个事实,但反过来,应该说编码劳动就是一种编织劳动,这在今天可能已经不是一个冷知识,编织就是编码的技术来源,计算机的原型是提花织布机。"孔煜也分享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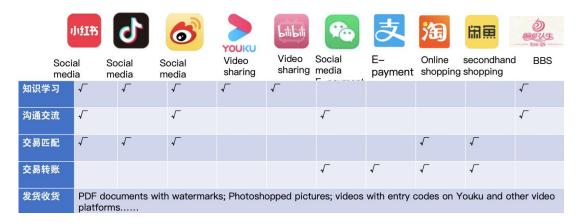


游戏《双人成行》的女主角小梅编织玩偶图解(左)和成品(右),教程来自小红书博主"娟",图片由嘉宾提供。

"双重编码"的第二重编码聚焦在织女对于平台的使用。"编码"的实际意义是织女超越编码者(平台企业)的编码意图,对平台基础设施进行创造性利用。织女不仅在与算法的互动中绕开平台为用户"种草"的编码意图,更反过来利用平台算法进行知识学习、交易,使其实现产品设计之外的功能。据孔煜也说,无论是零基础的还是作为圈内大佬的织女在日常工作中都会运用到非常复杂的平台策略。从购买材料、学习编织、交流磋谈、客户交易到转账和最后发货、收货,织女工作中的每一步都需要她们根据平台自身的特征、功能和优势进行比较,选择使用或转换平台。



孔煜也举例道: "一个比较典型的这种综合使用平台的案例是这位织女,她在采访中说她刚开始学习是在小红书上,然后就决定试一试,学了一段时间发现有老板可以接单,她通过小红书或其他平台加了这个老板,进入这个老板放单的群。关于定价她会去私信问这个群里其他的姐妹,这个定价是不是合理?如果合适的话就接这个单,然后做好之后她再通过闲鱼跟这个老板进行这个转账交易,完成这样一整笔交易。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听起来很顺滑,但其实已经运用到了非常复杂的一个媒介素养。"



织女们工作过程中为完成不同步骤转换使用的平台,图片由嘉宾提供。

学员包与原创设计变现

介绍完互联网织女宏观背景以及双重编码的核心概念后,孔煜也重点讲述了她在线上田野过程中亲身体验或观察到的织女具身体验。在背景多元的织女群体中,有大量织女不仅为了兴趣学习和进行编织,也渴望通过编织变现。其中,没有独立经济收入、长期在家带娃的"宝妈"是有此类需求的重点群体。"学员包"正是为她们"量身定做"的。"很多零基础的织女,在抖音和快手上发现卖学员包的师父,她们直播时说我们 298 元、398 元卖一个学员包,里面有你需要的所有基础工具,比如毛线,包括一些教程。



最吸引人的是,她保证学员做的所有东西都会收,保证客源。于是很多织女购买这样的学员包。"孔煜也指出,这样的师父收学员本质上是通过学习渠道和交易渠道这两方面的信息不对称,对强烈希望"赚米"的宝妈实现精准收割。"还是刚才那位织女,她最后发现说你根本不需要这个师父,小红书上面有很多免费教程,你很快就能学,学完之后你就能在小红书上自己找老板,压根就不难。你学好款式跟流行季节款走,然后自己做好再发小红书出,非常简单。"



一些平台上的"学员包",图片由嘉宾提供。

而学员包只是织女面对信息庞杂的互联网编织圈的诸多"坑"之一。更多时候,许多织女面临的是无处不在的"潜规则"。其中"开团"就是一个例子。许多发布自己原创作品的织女会通过发帖、发海报招募其他想学习这个作品织法的人,设置一段时间的"团期",这个期间可以联系上发帖的织女,参考发布的参团要求,如转发海报等,付费或免费参团。规定时间内,学员需要按照图解交作业。"这个过程还有很多黑话和术语,比如说'禁止二改',就是你不允许改我的原创设计,包括如果你没有在规定时



间内交作业的话,你就会被'黑团',就是说我以后不跟你交易了。其他的各种还有很多很多。"自己 也是织女的孔煜也对于这些规则显然有着非常细致的观察。"这么复杂的要求在今天比较少见了,背后 的原因是规模变大了,原创织女的客户越来越多,她们的核心诉求不再是保留亚文化圈子的封闭性,而 是保护自己的版权。"这也是有原创能力的织女们通过编织变现的最核心条件与手段。

一种去中心化的组织与替代父权的想象力

就这样,织女社群作为零工经济的一部分,形成了一种辩证的生产关系,呈现了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在社群里创造出的无法避免的参差。在社群里,拥有更高的学历或社会地位的织女有资源接受专业课程的学习,更能够尝试原创,因而能在生态中拥有更高地位、继而赚到更多钱——织女组织中的整体经济回报大部分依旧流向了社会结构中占相对优势地位的群体。

然而,在这样有着复杂生态、多元背景的广泛织女社群里,孔煜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 "在我参与的这些所有织女社群当中,没有一个社群只谈生意,几乎所有的社群都有替代性情感支持的网络。"织女们在群里讨论的许多内容是她们跟身边最亲密的朋友都不会讨论的,包括婚姻的隐痛、生育、流产等隐秘的事。这说明织女社群更像是一个松散且可持续的生态,它通过编织这个行动或者爱好,联结、展现了广大妇女群体在私域里极其多样的生命力。这些看似边缘的"互联网织女"以柔韧的方式重塑平台与劳动的边界: 她们把本为培育消费而生的"种草"算法转化为新的生产工具; 把平台设计的机制改写成兼顾母职与收入的劳动实践。在算法的夹缝中,织女们完成了一次对固定资本的"柔性夺权"。更值得深思的是,她们作为基层劳动者与技术编码者的双重身份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技术与父权的替代性视角。在



技术加速主义一往无前的浪潮里,这些被长期忽视的妇女劳动以其沉静而顽强的创造性传达了另一种力量。

圆桌对话



从艺术家到学者:如何与"织女"相遇



王佑佑:我捕捉到一些重要的关键词,织女社群与情感网络。王慰慰提到与艺术家合作的女性纺织工人们,不仅集体劳动,也集体生活。孔煜也在分享的时候也是,在互联网上的织女,虽然不在现实中生活在一起,但她们共享一个情感网络。胡尹萍与她合作的"小芳"姐姐们也形成了相互照应的关系。所以这个社群不仅是经济和劳动上互通有无,也在情感与日常生活中紧密相连。

接下来的对谈,希望从一些实际的问题出发。首先,很好奇各位老师如何与这些织女群体相遇?比如,胡小芳项目十年以来,经历过来自不同地域和身份背景的织女姐姐,胡老师您如何跟她们打上交道,判断她们适合参加"小芳"项目?

胡尹萍:我们很简单,主要靠人传人。我刚才听到煜也的分享,我挺惊讶的,原来(网络上)也有这样的织女群体。我们不一样的点在于,我们所有的针法、方式都是开源的,恨不得大家如果感兴趣都去学。我们的姐姐互相之间也在教,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不太一样。比如说,有一位来自贵州的姐姐,她那一条街上都是卖玩偶的,因为地理上快递受限,她没有办法给我们及时地做一些东西,我们就到了贵州,教她如何打破小红书上的针法,鼓励她去做跟别人不一样的,这样子她就可以在恶性竞争里脱颖而出。后来,她在那条街上卖得最好,其他姐姐看她做得不一样、销量又好,她们也开始慢慢做得不一样,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竞争关系,等于是我们搞乱了他们的市场,也让姐姐们自己去想想怎么样才能做得不同。

王佑佑:谢谢胡老师分享。我想问问煜也,你在做传播学研究的时候如何选择你的田野对象?你是如何



进入这个群体的? 作为一位学者, 你如何跟织女这个群体打交道?

孔煜也: 我之所以开始玩钩织是因为当时疫情期间没有地方可以去,而编织是一个非常疗愈的活动,所以开始自己做,学的时候发现有这样一个社群,大家可以交流技术知识,但我非常不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发言,几乎不怎么发帖子。我打算做这个研究之后,需要去养号,可能是为了版权保护,或者因为这个群体还是有一些趣缘爱好者社群的性质,存在封闭性,所以无论要加她们的群聊还是参团都需要你证明自己真的是一个钩织爱好者。要给审核者发你的作品,或者社交平台的截图证明你发过相关的东西。所以我先养了一段时间的账号,在自己的小红书上织完就发。通过这样的方式打入了一些织女的社群,在内部进行观察。

开始进行观察之后,我发现网友其实都还是比较开放的,他们是愿意跟你聊天的。我会选择一些不同性质的、比较活跃的群聊,有的是比较常交流爱好的,有的是主要放单接单的、比较商业化的,我在其中选择比较有代表性的群,去跟他们的群主进行沟通。其实我还我没有遇到过特别不友好的,大家还是相对比较开放的。比如说我希望在群里发一些问卷,或者征集一些访谈的对象等等,都会得到比较积极的反馈。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比较活跃的织女,甚至不需要你特别多的鼓励,她会主动跟你聊。另一方面,可能有很多从来不在群里说话、默默潜水观察的人,就像我一样。而我希望能够接触到沉默的大多数,所以我会发一些小额红包,鼓励大家去填问卷。然后再通过这个问卷调查结果,在人口统计学的多样意义上去选择我的深度访谈的对象,通过这样的方式我尽量地接触到不同技能水平和背景的织女。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庞大的学习的过程。我不知道男性趣缘社群是不是这样,但我发现织女这个群



体相对比较友好,甚至她们能够提供很多情感支持,就是所谓的情绪价值,这个过程当中带给我很多感动。

王佑佑:感谢煜也的分享,听到了很多你的切身经验。我也好奇织女接受你的调查问卷的时候,是把你 当做她们的一员吗?还是一个外来的观察者?她们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接受你的调查?

孔煜也:对,如果把我当成织女群体的一员,对我的调查研究来说会比较容易。实际上我发现,如果和她们说你是学生在做研究,说了跟没说是一样的,因为做研究是很抽象的一个表述,对方无法具体地说理解你在做什么;所以反而我不是非常正式地说我是研究者,而说我也是爱好者。当然,我要尽一些揭露的义务,我肯定会和她们说我需要获取你的信息、会做隐私保护等等,这些都是必要的。但相对而言,作为爱好者的姐妹跟你来交流,肯定交流的效果是更好的。做这种有一些亚文化性质的研究的过程中,可能自己本人必须要有切身体验,很难说我完全是作为一个外来者去做这个研究,我很难想象这个研究会怎么进行。

工艺、劳动与艺术的交织

王佑佑:接下来,我想稍微把大家的注意力带回艺术相关的部分。今年春天,慰慰老师在 CHAT 策划了展览"涌动的暗线",呈现多位民间美术工艺实践者和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我很好奇您是如何在策展实践的过程中选择从事纺织艺术相关的实践者、工作者?以及,如何将他们和当代艺术构建起对话关系?



王慰慰:其实我不是学当代艺术出身的,我是学古代美术史出身的。我加入 CHAT 的时候,对纺织一无所知。加入 CHAT 之后,我开始了解纺织,就像之前讲到的编织跟编码的关系,对我有非常大的冲击。我尝试跟一些传统的织机去做实践的时候,发现我完全没有办法编织。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高深的技术,它需要精密的计算:计算经线、纬线之间的关系。我发现,哇,这么古老和传统的编织原来是需要大量的智力,甚至对于色彩的搭配,其实是变相的数学学习,是一种与现代科学不太一样的技术,也是一种美学的挑战。所以我非常强烈的感受是,所谓的工艺和艺术其实不应该做现代性的分野。

在我的学习过程中,我从工艺从业者的身上学到非常多的东西,不仅是技术,还有观念性的启发。所以当时在做"涌动的暗线"展览的时候,我没有区分参与者是手工艺者还是艺术家。比方说在展览当中,我们展出了一批中国 1960-90 年代崇明岛上的手工印花布。从这个花布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中国所经历的变化,从困难时期,甚至是争议时期到改革开放。而这段历史往往被忽略、被掩盖。我觉得,花布的价值与我们所定义的艺术的价值是完全同等的,所以当时在这个展览中,我们是并置了工艺与当代艺术,没有做任何的区分。当然在实践中,出于美术馆项目的角度,我们会以艺术家为牵线者。如果一些艺术家对某一种工艺非常感兴趣,那在我们的项目中会尽量让手工艺者跟艺术家以平等的状态去彼此启发、共同创作。在面向观众展示的时候,我们并不希望做太多明显的区分,最主要的还是突出它的价值和对我们生活的启发。

王佑佑:谢谢分享,这个问题与接下来的问题密切相关:工艺或者偏劳动性质的创作和工作,与艺术之间是否有分野?刚刚已经听到了慰慰老师的答案。然后我想问问胡老师,您在跟"小芳"姐姐们的共同



工作当中、以及看到她们编织的实物之后,有没有一个瞬间会觉得她们也像艺术家?

胡尹萍:其实我没有把姐姐们当成织女,我也没有以这样的方式来定义她们,因为我们希望她们做的事不要停留在技术研究,比如说什么针法,什么花型,我们从来不会做这样的一个要求。我希望能做到的是,她们在参与这个事情的过程中形成自我观察,比如说她怎么去认知自己,她想象的那片大海是什么样?她会织一个什么样的比基尼给自己穿?这个比基尼源于她们对自己生活的观察。我觉得这些大于她们对技术的研究。我自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针织,她们可能也不懂艺术;我们也不希望去教会她们什么是当代艺术,因为我觉得当代艺术比起今天她要吃什么、买什么鱼、给孩子们买什么玩具,一点都不重要。她们的生活是最重要的。我能做的就是,她们通过参与这个事情,去感受她自己的生活,用最简单的技法做出她们理想中的生活,去思考她们自己人生的重要时刻。她们这代人可能是非常模糊的一代人——就像你不会对一个临时的清洁工阿姨要 CV 一样。你用的只是她们最廉价的劳动力,你不会去审核这些(书面文件)。但是我觉得她们是最应该去想一想自己这一辈子都做了点什么的人。

我邀请她们做 CV 的时候,没有说要做什么样的针法,只说了可以去多想想自己人生里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一些关系、最亲密的人,然后把她们想说的话放到自己的 CV 里面。从这一点出发,"小芳"项目跟煜也的研究对象不太一样,我们从不在技术上去过多地做工作。

理想的组织方式与织女的未来

王佑佑: 煜也的文章提醒我们要警惕一些纺织女工或者织女成为劳动链条里面的最底端, 比如获得很少



的劳动报酬或者不多的尊重。那胡老师也介绍了她跟姐姐们如何相处、如何引导姐姐们进行编织并获取 劳动报酬,鼓励她们去认真思考自己的人生。"胡小芳"项目是不是我们探索织女组织方式的一个很好 的样本?

孔煜也: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样本了,我觉得是因为胡老师她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身份和她的创作初心。我很早之前就看过胡老师做的影像,就是刚开始放的那个视频。胡老师可能是从对自己妈妈在家里做零工的现实的关怀出发,发现还有很多和妈妈有着类似经历的姐妹们,在进行很廉价的、越来越卷的劳动,但是对于她们来说能挣一点是一点,即便她们知道获得的报酬跟劳动付出不匹配。其实很多互联网织女也是这样的心态,一直有织女愿意做,然后这些老板就一直能收到货,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很难看到让织女们的劳动获得比较合理报酬的可能性。

但是胡老师是从个人的关怀出发,她作为一个艺术家投入了很多,"小芳"项目又是以集体创作为方式的、注重原创性的劳动,那么这样相应组织起来的小规模生产组织就比较可持续。从整体上来说,大家的报酬分配可能会相对比较合理,不会是大规模、商业化。

胡老师的组织,和我在前面提到的那种你不做、总有他人愿意以更低的价格做的生产组织还是不太一样。但是如果我们问的是,胡老师的生产组织作为一个范例,能不能推广出去,去做更多这样的工作室和团队或者生产组织的话,就现在看来还是比较困难。这是一个全球产业链的问题。大量的织女,除了在国内自己做之外,还有很多往国外批发。批发是一个全球产业链,又有中间商去协调,比如圣诞树挂件等等,可能不同地方有不同的需求。全球产业链的话,很难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扰动的可能性,尤其现



在,大家会觉得这是比较边缘的琐碎的生意,不太会有大量的官方资源或者是社会的资源投入到里面。

但是无论如何,就像我去做这个研究的想法,还是有必要把这些另类的可能性提出来,这些可能性它是 存在的。即使是乌托邦式的一种途径,我觉得只要提出来它也许就有下一步。

王慰慰:我也一直在跟踪"小芳"项目,之前我们在 2021、2022 年跟煜也也有合作,关于她研究的延安织女运动的研究。从她们两位的实践,以及我们的实践当中,我看到纺织带给女性的情感支持和自由。它让我想到香港跟广东地区的自梳女的历史。自梳女也是一批反抗婚姻枷锁、决心不结婚的女性,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因为养蚕丝业的发展,她们能够通过丝织产业自己在家里面织布、获得经济的自由,所以她们不需要依附夫家,不需要结婚,就决心不婚,自称自梳女。

在我们现在的研究里面,汕头的蕾丝也是一样。它由传教士传入汕头,蕾丝的制作使得大批的女性可以接单、自己在家里工作。虽然今天这个技艺在慢慢地衰落,但是过去她们在制作蕾丝的过程中,因为白色对于中国来讲是不吉利的,所以就慢慢发展到她们加入颜色,做出她们自己的特色产品。这样的女性自助自立的经济状况,通过纺织也好,其他也好,自古都有。但是我觉得现在社会的宽容度比较高,可能那个时代女性主要通过手工养活自己,仍处于社会底层的地位。现在,比方说煜也老师的研究,胡老师的项目,它可以从最初就介入一种更批判性、更艺术性、创意性的思维,让女性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反思自己的所谓的母职,思考是否能够从母职的枷锁当中找到一点空隙,不管是在情感上获得一种支持,还是经济上获得一种支持,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其实也并不只是纺织,它只是在提醒我们作为女性,什么才是我们人生的自由吧。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

长线公共实践的可能性

王佑佑: 慰慰老师在分享中提到了一些长线的项目,贯穿四季,以我自己做公共活动的经验和观察来看,

维持观众长期参加公共项目非常困难,请问您有什么方法吗?

王慰慰:这个很难的,我们遭遇很多的问题,其实我们在做"种学织文"的项目,要保持那些——我们

称他们为 seeders——种子队,要保持他们的长期的粘性非常困难。可能一开始有 20 个人,慢慢变成 10

个,最后经常能来的也就可能是6个。我们的策略是更多地去跟学校合作,因为学校有教育的任务,我

们可以给他们创造内容,所以这样的粘度会相对比较好。但这是自上而下的项目的局限性。我发现跟社

群合作的项目还是要自下而上,比方说像煜也要打入织女内部,自己去学钩针,然后跟织女团体进行紧

密的合作。所以我们其实一直在反思究竟要怎么做。很多时候我们的同事也要跟那些种子队(seeders)

成为朋友,慢慢地让他们能够越来越信任我们,同时也让他们要对这个项目抱持拥有感(ownership),

他是这个项目的主人,这个是最重要的。

文字整理: 丁子然(UCCA 公共实践部实习生)、王佑佑